



關於《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

◎ 文字工作者／蘇惠昭

爲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這是寫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解釋他出版《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雅言文化,2003）2001,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一書的理緣：20世紀，在知識份子不受迫害而且可以暢所欲言的國家，爲什麼仍然有不少人選擇與暴政、暴君站在一邊，敞開雙臂歡迎法西斯與共產政權，或者親身參與迅速轉型爲傳統型暴政的「民族解放」運動？爲什麼？這些知識份子的心靈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如何決定？他們在政治中尋找什麼？他們何以能夠如此的不負責（reckless）？

馬克里拉試圖拆解上述問題，不過《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這樣一個書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保羅約翰遜大卸知識份子八塊的《所謂知識份子》，兩本書一樣是對知識份子的批判，根本的不同是，代表「保守知識份子」陣營的《所謂知識份子》是對「進步知識份子」私生活、個人行爲展開的火線攻擊，所以八卦紛飛，被點名的知識份子一個個變成了「社會啓示錄」、「藍色蜘蛛網」中的最佳男主角，簡直不堪聞問；自由主義心靈的馬克里拉則私淑1953年波蘭詩人米悟虛（Czeslaw Milosz）所撰《攻心記》*The Captive Mind*（註：此書皇冠曾有出版，現已絕版），透過四位波蘭作家的故事，米悟虛想要彰顯，當某些性格、某些類型的心靈被推進政治的旋風時，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作者提出了6個名字：海德格、施米特、

班雅明、科耶夫、傅柯、德希達，每一個人都是牽動思想板塊位移的現代思潮大宗師，大師中的大師——一般大眾不識他們思想和宛如天書的著作，卻震懾於他們的名字和影響力，不過根據馬克里拉的判準，這份名單顯然少了一些人如盧卡奇，如霍布斯邦，一直到98年霍布斯邦接受訪問時，這位當年支持史達林的左派史學大師還堅持說「爲了更美好的未來，數以百萬人的犧牲是值得的」，聽起來十分驚悚，還有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他一度頌揚人有自由選擇的獨特能力，十年之後卻宣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當代無法超越的地平線」，至於馬克里拉的標竿可以當代法國政治哲學家雷蒙艾宏（1905-1983 Raymond Aron）爲代表，書中他不只一次提到艾宏和他的《知識份子的鴉片》（聯經中文版），艾宏認爲，法國左翼知識份子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篡改爲一種意識形態，甚至變成一種「世俗宗教」，是以陷入理想主義的政治狂熱，並據此預言「意識形態的終結」，他還以「介入的旁觀者」發言，呼籲知識份子要自許爲獨立自主的觀察者，並對自身的公民身份與意見製造者的角色保持恰如其份的自覺——不過站在對立面的知識份子顯然不作如是想。

那麼被馬克里拉點名的知識份子到底做了什麼「不負責任」的事？

海德格最具代表性，這位被譽爲20世紀的最偉大哲學家從1931年開始表態支持納粹，積極爭取出任未來堡大學校長，同時加入納粹黨，巡迴德國宣傳演講時，末尾總不忘高



喊「希特勒萬歲」，而他的情人漢娜鄂蘭和至交雅斯培都受過納粹迫害。馬克里拉推論，在海德格《存在與時間》一書中，確實存有「更高一層的政治」新觀點，「海德格在納粹主義中看到一個美好新世界的誕生」，而且至死不渝，有人問過他後不後悔早年的政治決定，他的回答是：「除非希特勒活過來，向我道歉」。

以反自由主義聞名的施米特是20世紀頂尖的政治理論家和法學家之一，他差不多和海德格同一時候加入納粹，也一樣至死不悔，成為希特勒的「御用法學家」，為「本身就是最高正義」的希特勒行動提供法學的正當和合理性，他常引用希特勒的一句話：「我抵擋猶太人，從而為上帝的志業奮鬥」，紐倫堡大審時則以「基督教也曾造成數百萬人喪命」為屠殺猶太人辯護。

施米特的信念是為「決定主義」，他不認為有所謂自由主義的政治，因為政治無可避免會涉及主權決定，而自由主義畏懼做決定甚於畏懼敵人，政治因敵人而成立，沒有敵人就無法確定自我，沒有敵人就沒有政治，但人的本性就是好鬥的、畫分敵我的，施米特的政治觀念引人入勝，眼下我們所見到的政治現實也確乎如是，他所服膺的「每一個群體都需要一個最高統治者以負責在最極端或最特殊的處境中做出決定」把自己帶上了「希特勒萬歲」的不歸路，而我們因此學到什麼呢？

在逃亡納粹途中自殺的班雅明出現在馬克里拉的名單中有點無辜，因為他罪情很輕，不可承受之輕，馬克里拉主要批判的是他的彌賽亞思想，班雅明心向神學，相信人們必須在墮落的世間尋找出路，他一方面想要遠離塵俗遁入神秘主義，一方面又期盼以新律法、新福音、新社會秩序來拯救世界，以致對共產主義式的救贖產生幻想，眼睜睜看著世界群魔亂舞。

科耶夫是誰？十年前只有法國人才知道，後來因為法蘭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時報中文版）名噪知識界，而福山引用的現代歷史與政治理念即來自科耶夫。科耶夫有兩個角色，一是黑格爾權釋者，哲學權威，梅洛龐蒂、雷蒙艾宏、布荷東都是他的門徒；一是政府高階官員，他不認為哲學是為尋求永恆真、善、美所進行的超然省思，永恆觀念並不存在，所有觀念皆源自人類鬥爭歷史，所以人必須積極參與歷史，而現代暴政能夠推動歷史的運作，為美好的未來鋪路，哲學家因此應該和暴君配合完成歷史的任務，對於人在鬥爭中可能失去的人性科耶夫則冷漠以對。

傅柯和德希達則是臺灣知識界認識模糊卻景仰而言必稱之的大哲學家，馬克里拉說傅柯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尼采信徒，一個本質上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家，1968年法國巴黎暴發的五月革命召喚他轉換舞台向政治傾斜，不是一個領導者，而是跟隨者，激進的追隨者，十年後的伊朗革命，他則以報社特派員身份兩度造訪，頌揚革命的「如醉如癡」，讚譽革命領導人的「政治靈性」；至於德希達，在用話語「解構」了西方哲學傳統中的每一項政治原則如自覺、主體、自我、社群、意志、自由、良知種種之後，到了九十年代，淡出法國，卻大受美國人歡迎的他忽然提出一個用來抵抗解構的觀念：「正義」，但這「正義」如何可得？德希達指出，因為它超越任何經驗，無法明確陳述，所以只能用神秘的方式去體驗，當正義遲不降臨，我們只能學習等待——又一種彌賽亞主義的變形。

從極左的馬克思到極右的法西斯，一個20世紀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挺身捍衛暴政？以撒柏林、雷蒙艾宏、哈伯瑪斯、湯瑪斯曼……，很多人都回答過此一大哉問，馬克里拉揭



曉他個人的最後答案，也就是「將心靈引向暴政的更深層力量」，答案要回到希臘時代，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哲學。

柏拉圖認為有一股力量會吸引人走向暴政，但吸引人走向哲學的也是同樣一股力量，就是愛，愛力(eros)，而蘇格拉底如是解釋，愛追求「善」，但愛所引發的狂熱有時候也會變成「惡」的幫凶，愛的狂熱，這就是暴君的

靈魂，但還有一種暴虐的靈魂，他們不是以統治者，而是以導師、演說家、詩人的身份進入公眾生活，公眾傾聽、追隨、崇拜他們，以為他們心靈獨立，殊不知他們只是被自身體內的魔鬼所驅策，為的是爭取善變群眾認同渴望。

每一人體內都有那個魔鬼，魔鬼也可能是我們最親愛的那個英雄。

德文

